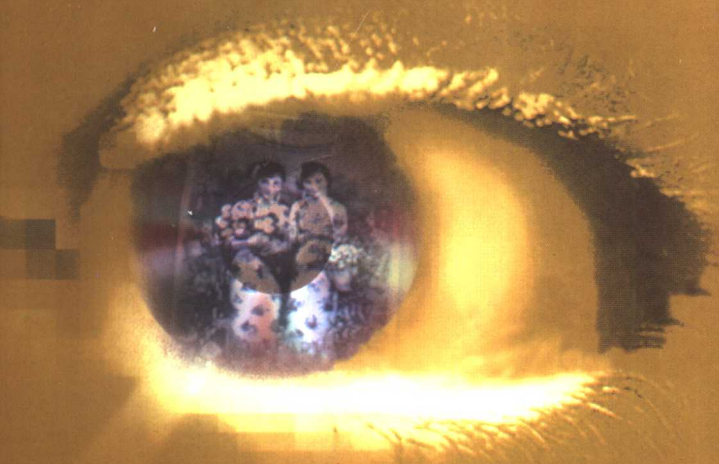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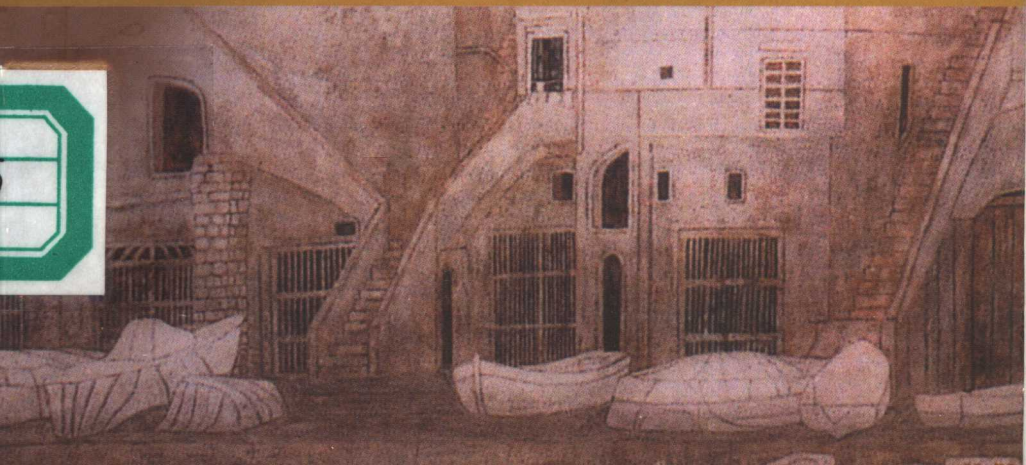
江西财经大学学术文库

近代文学与传播

包礼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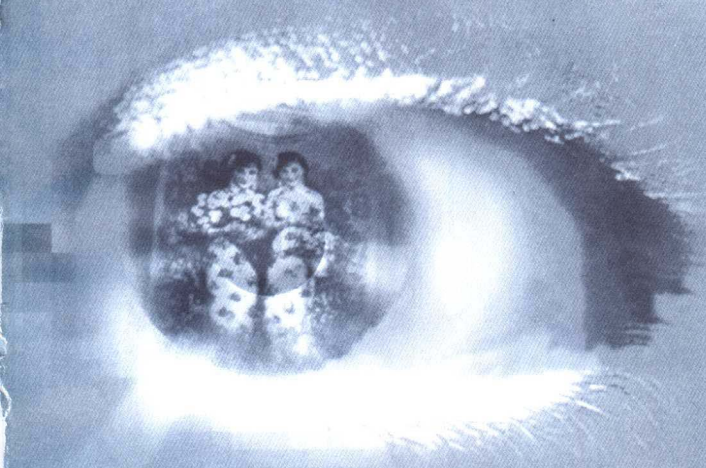


江西人民出版社



近代文学与传播

包礼祥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近代文学与传播/包礼祥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3

ISBN 7-210-02529-4

I. 近… II. 包… III. 近代文学
—文化交流—中国 IV. 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1960 号

近代文学与传播

包礼祥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 1 日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80 千 印数: 1-3000 册

ISBN 7-210-02529-4/1·395 定价: 15.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政编码: 330002 传真: 8511749 电话: 8511534 (发行部)

E-mail: jxpqh@163.net

序

公元 676 年，唐代诗人王勃去交趾探父，途经洪州（江西南昌），在都督阎伯屿的盛宴上写下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其中有“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赞誉江西的佳句。千年的历史证明，王勃之言并非客套的溢美之词，而是据实之言。从盛唐至宋，江西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唐宋八大家江西占了三家。从长江经鄱阳湖赣江，翻越大庾岭经梅关入广东，商旅不绝，十分繁荣。近年的江西，志士仁人辈出，尤其是土地革命时期，江西籍的革命烈士（有姓名记录者）达几十万人。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又逢盛世，江西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又临新机遇，京九铁路开通，大大改善了江西的区位条件，当初“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优势重现，“雄州雾列，俊彩星驰”胜景盛况再来，江西这块交织着历史文化沉淀和革命传统的红土地，将展现新的风采。

江西财经大学是一所以经济、管理类学科为主，工、法、文学科兼有的新型多科性经济类大学，始建于 1958 年。学校在“九五”期间的目标是以“在江西有优势，在华东有特色，在全国有影响”的第一流高等财经学府的姿态进入 21 世纪。作为学

校“九五”发展规划的一部分，我们编辑出版《江西财经大学学术文库》（简称《学术文库》），以期展示检阅我校教师的科研成果，推动我校科研工作和学科建设迈上新的台阶。《学术文库》将收录我校专家学者多年潜心研究获得的学术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优秀研究报告，尤其是青年学者的力作。它们的内容涉及经济、管理等学科前沿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其中不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中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江西财经大学学术文库》将成为我国学术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

在此，我特别要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社长林学勤先生和有关编辑，由于他们对学术研究的深刻理解和大大支持，我校的《学术文库》得以顺利拓展。

史忠良

2001年7月16日

目 录

绪论 近代文学与传播的互动历程·····	(1)
第一章 近代小说与传播 ·····	(17)
第一节 繁荣诸相及其传播背景 ·····	(18)
一、近代小说著译并行透视 ·····	(19)
二、连载单行相辅探因 ·····	(33)
第二节 小说观念与传播 ·····	(39)
一、近代小说观的产生与传播观念的转变 ·····	(40)
二、理论派别以传播为畛域 ·····	(50)
第三节 小说创作与传播 ·····	(63)
一、记者视点 ·····	(63)
二、程式化与广告运作 ·····	(70)
三、创体与破体 ·····	(73)
四、小说体类的更迭与读者影响 ·····	(79)
五、近代小说进程与传播意图 ·····	(88)
第二章 近代诗词与传播·····	(107)
第一节 新诗料引发诗词新作·····	(107)
一、反映传播活动的诗词·····	(107)
二、心无宁时：传播冲击下的近代作家心态·····	(109)
第二节 “诗界革命” ·····	(111)
一、“诗界革命”的历史·····	(111)
二、“诗界革命”的理论和做法·····	(114)
三、“诗界革命”的创作·····	(115)
四、近代歌词创作之盛与传播效果的企求·····	(123)
第三节 词的扩张·····	(125)
第三章 近代散文与传播：新闻文学的兴起·····	(130)

2 近代文学与传播

第一节 传播效果的追求：“新民体”的诞生·····	(132)
一、“新民体”的诞生·····	(132)
二、“新民体”的特点·····	(134)
第二节 成熟的新闻文学：黄远生的通讯·····	(136)
第四章 近代戏曲与传播：戏曲改良运动的开幕·····	(146)
第一节 又一种传播利器：近代人的戏剧观·····	(146)
第二节 醒世教科书·革命动员令：近代戏曲的主旋律·····	(151)
一、传统剧种的新变·····	(151)
二、话剧的传入及其中国化与革命化·····	(158)
第五章 近代传播语境中的文学研究·····	(166)
第一节 西学话语中的文学研究·····	(167)
一、比较文学的兴起及其特点·····	(168)
二、科学研究方法的可贵尝试·····	(184)
第二节 政治话语中的文学研究·····	(188)
一、改良·醒世·反清·激发种性·····	(188)
二、“文治之进化”：近人对中国文学演进规律的探求·····	(190)
结语 关于文学与传播关系的思考·····	(200)
第一节 中国文学与大众传播的历史联系·····	(200)
第二节 文学与传播关系探赜·····	(202)
一、尚真：新闻与文学的结合点·····	(202)
二、事中有入：新闻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前提·····	(205)
三、媚俗的必然与消解·····	(207)
主要参考文献·····	(211)
后记·····	(217)

绪论 近代文学与传播的互动历程

传播在这里指大众传播。“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1] 中国近代的大众传播包括近代报刊、出版业，以及并不多见的通讯业。文学在本质上也是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传播，作家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化为形象的语言信息，以影响读者。但文学不是大众传播。文学和大众传播发生密切联系，可以说是中国特色。^[2] 这一特色的形成和突显则在近代，即中国大众传播发轫之时。诚如丹纳所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3] 曹聚仁说：“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4] “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而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5] 我们考察近代文学，是不能也不应忽略它的大众传播兴起的“环境”的。

1818年8月5日，以中国人为受众目标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创刊。这是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1833年8月1日，《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在中国本土广州创刊。1861年11

月，字林洋行创办《上海新报》，是为上海最早的商业性中文报纸。1872年4月30日，英商美查(Ernest Major)创办《申报》，这是近现代寿命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文商业报纸。1873年8月，艾小梅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这是国人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张报纸。^[6] 1874年2月4日，王韬等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王自任总编主笔，著名文人办报由此开端。当然，在甲午战争以前，许多人大梦未醒，而清政府又严禁国人办报，中国报业发展缓慢。甲午战败，马关约成，大梦初醒，统治者中也有人认识到须变法自强，报业因之高速发展。1840年到1895年，中国报刊(含海外华文报刊)仅110余家，1897至1898两年内所办报刊则达104家，1896年至民国成立更达1600多家。^[7] 民国成立至二次革命，全国有报刊500家。^[8]

由于新式书籍出版需要更大的投入，同时，在科举废除以前，它的受众远不如报刊多，近代出版的发展速度、声势都逊色于报刊。但自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 Medhurst)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后，具备机械铅印设施的新式出版机构层出不穷。1897年夏瑞芳等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和1912年陆费逵等创办的中华书局对近代社会的影响不亚于报刊。需要注意的是，近代出版的特殊格局：出版兼办报刊，或报业从事出版，是很常见的事。

近代传播业对当时的文人不可能不产生影响，尤其是正值民族国家生死存亡之秋。确如袁进所说：“凡是近代的进步文人，大抵都与报刊发生关系。”^[9] 近代文人与传播有了这番不解之缘，使我们无法撇开传播去言说文学。近代文学的许多问题，如文体尊卑观念的变化，小说、戏剧的繁荣，近代文学的总体成绩与缺失，近代文学的总体特点，散文的变革，乃至诗风的转移，离开传播语境，都难以说清说好。

近代传播对文学的影响是从传播对文学的曲从开始的，即传播首先文学化，然后使文学传播化。

大众传播的内容在那个时代唯有以文字来传达。中国本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观念，不论什么文字，人们总喜欢弄得古雅些。传播者多无传之万世的大志，他们不会因此去求“文”。甚至有些传播者也缺乏这样的功力。但他们的中国受众却有这样的要求。为了传教，为了觉民，或为了金钱，面对封闭自大且深嗜文学的近代中国受众，传播者不能不主动妥协，竭力把原本无需甚至不宜文学化的报章文体文学化，许多报刊干脆刊登文学作品，甚或创办专门的文艺报刊。

“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0]，不仅每期在封面报名左边印着“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以圣人语录招引读者，且以儒学附会基督教义，“让中国哲学家们出来讲话”^[11]，写作中大量使用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小说的手法，如章回体与小说套语，并刊登笔记小品和七言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每期封面报名右侧也印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古训，后期也刊登《诗》、《李太白文》、《苏东坡词》、《东都赋》，并介绍希腊诗人荷马及其《伊里亚特》，夸耀西方文学。

这类外籍报人没有丰厚的中国学养，也未交欢中国文士，更无中国文人助事，他们仅为售卖其说而首先迈出传播文学化的小步。能力有限，又没有经济、政治的压力，这种文学化无法到位，难以产生大的影响。

那些更了解中国国情的传教士深知士人在社会中的作用，他们不再被动迎合受众，一方面宣扬西学，同时调动文人积极性，请他们编报，向他们征文。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 创

办的《万国公报》就是这样的。他延聘沈毓桂、蔡尔康、范祎、袁康等主持笔政。1895年6月，傅兰雅发表《求著时新小说启》以激引文人：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显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12]

《万国公报》的做法应该说是受了商业性报刊的启发。这类报刊为追求经济利益，采用一切办法来吸引读者。他们明白：当时的读者不是一般大众，而是社会的上层——官绅。《申报》一直聘请中国文人主持笔政，蒋芷湘（1872年4月30日创刊起）、钱昕伯（1884年8月起）、何桂笙（代钱主事）、黄协埙（1895年12月8日起）、金剑华（1905年2月7日起）、张继斋（1907年起）先后任总主笔。^[13] 报主美查不干涉编务，“事事听其裁夺。”^[14] 这些主笔多深谙中国读者的癖好，以免费立言相诱。他们昭告天下说：

有名言说论，实有系乎国计民生、地理水源之类者，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穡之苦，附登斯报，概不取值。

这话出乎传播本身的需要，也是立言的正则。但专制下的臣民噤若寒蝉，无人回应。他们又说：

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地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15]

这种迎合激起了文人的浓厚兴致，他们踊跃投稿。致使《申报》无法全部刊布，便于同年11月11日创办《瀛环琐记》月刊（1875年2月易名《四溟琐记》，1876年2月又易名《环宇琐记》，1877年停），以专门刊发这些征稿。这样，稿源丰富，编撰压力减轻，人力支出大省。同时，还造就了大批热心读者，使它一纸风行，广告日多，财源滚滚。美查初尝甜头，继续依靠文人，并创设申昌书局，印售中国文史书籍，对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引导作用。^[16]

其他中文商业报刊纷纷效法《申报》。1861年11月创刊的《上海新报》是沪上最早的中文报纸，也是历史最长的商业性大报。它在《申报》发行之初即作出回应，刊发竹枝词、诗话。其主人于1882年4月2日新创的《字林沪报》每期必备诗词，后又刊发小说、小品，并于1897年11月24日出版附张《消闲报》以专刊诗词小品乐府传奇等文艺作品。《新闻报》挖来《申报》的蔡尔康、袁祖志（袁枚之孙）任主笔，并以诗词备格。

但外国人所办报刊中传播的文学化多是外在的，文学化仅仅作为促销手段，其文学也不是他们所要传播的内容。这样做的结果是，既使刚起步的中国近代传播偏离了世界典则，闹出一些笑话，又给中国文学中本已奄奄欲息的东西打强心针，让

它们得以残喘。它的意义仅仅是给后来的传播者以启发。

中国传播者的传播文学化则多出无奈。一则因为他们没有外国人拥有的特权。19世纪90年代以前，他们根本没有自主从事大众传播的权力，中国人不准在境内办报。^[17]此后，也难以一直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他们的消息、言论受着种种限制，有的不及刊发便被查禁。所以只好用文学作品来填补因此造成的版面空缺。有人为省麻烦，干脆不去犯禁，而以其他稿件充数，文学作品则是较保险且不令读者生厌的最佳选择。二是中国传播者往往缺乏足够财力，传播条件简陋，人力不足，自己无力采制足够的新闻稿件和言论，主笔只好自撰野史稗谈、诗词小品，或罗致友朋之作，以维持版面。这些文学当然更到位，但还是传播的附庸，还不致以影响文学的发展。

但多数中国近代传播者心怀壮志，他们从事传播旨在觉民救世。他们不甘心屈从暴政，往往旁敲侧击，通过文学作品透露个中信息，表明自己的倾向。托庇于香港的《中国日报》附刊《中国旬报》设有“鼓吹集”专栏，专刊文学作品，以游戏笔调讽刺满清朝廷，透现革命主张。傅兰雅的告启表明《万国公报》的主人也多属于有志的传播者。但这份操作性颇强的告启并未引发期望的收获。^[18]原因何在？我以为是时机不成熟。传播者意在使官绅觉醒，那时是无暇也不便写小说的，他们一心营造的是传播内容的正品——救世高论。韩子云1892年创办的小说期刊《海上奇书》缺乏来稿，似出同一原因。

“自改革”和维新变法的失败，使传播者认识到必须调整受众目标，以社会中下层为终极受众。这就使他们必须调整传播内容及其表达方式。高头讲论让位给小说戏剧已是必然趋势。恰在此时，这些深知文学社会功用的传播者风闻日本维新和欧美新政曾大大得益于文学，始知文学亦可作传播的锐器。于是

重拾傅兰雅的牙慧而广大之，倡导文学革命，传播的文学化跨出实质性的、必然大大影响文学发展的一步。梁启超便是极好的例子。

梁启超主编《时务报》时已在理论上认识到文学的作用，但《变法通议·论幼学》对说部书的论说只是作为他的社会改良措施的一小部分，而对小说的语言、题材提出要求。“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已实际开始，但也只是文学改良的行动自觉，没有理论的觉醒，更不作为传播的工具。《时务报》几乎不刊载文学作品。^[19]他在戊戌政变后亡命途中得悉日本维新的成功曾得小说大益，从而改变观念：发动文学革命，并以新的文学作品传播世情特别是政见。他很快写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在《清议报》第1册上发表；1902年又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张其意。他创办并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非常重视刊发这类作品，以之直接承载他们要传播的政治内容。这种做法虽然未能造就文学杰构，但取得了极好的传播效果，迫使原不重视宣传的革命派去竭力争夺传播权，并仿效这种方法。传播的文学化由此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传播的文学化得以实现，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学体制是杂文学体制。这种传统使传播文体有可能跻身于文学，或者说这些文章只要汲取了中国古代散文的精髓，就不难被认同为文学乃至文学杰作。事实上，传播的主导文体消息、言论，在写法上与古代记叙文、议论文是很一致的，只要作者经意，它们不难具备与古代散文名作媲美的实力。因此，报章不乏被目为佳作而进入选本的作品。^[20]

回首传播文学化的历程，对我们确定近代文学的起点、理解近代文学的性质是有益的。陈子展、朱自清、吴文祺、余霖陶都认为近代文学开端于戊戌维新运动，因为“从这时候起，

古旧的中国总算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21] 我以为这觉悟与传播有密切关系，民主、科学和现代意义的爱国精神的启蒙是由传播催化的。

文学是怎样传播化的？这种传播化的表现和结果怎样？这是我们尤应追问的。这里说其大概。

传播主体和文学主体在近代中国的重合现象是较为突出的，这是文学传播化的最主要原因。相同的主体，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外来传播观念的类似，很容易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文学和传播从观念到体式上混同起来。

“言志说”是中国文学的开山纲领，志则是关乎社稷的政治性主体情怀，传统文学的正宗——诗文——是应该写这些东西的。“发愤著书”、“不平则鸣”固然主张抒写个人情怀，这种情怀切于个人际遇，但这些穷愁之感出于淑世的政治抱负和现实的不合理想。这样一则借发泄获得心理平衡，二则确立士的人格。由于社会亘古不变，人们易于理解，可以以自我表白为主。每届乱世，世事急变，则多写实议论之作。因为穷愁之志必须藉实事方能显明，社会良心须出以呼吁才足透现。近代正逢多事之秋，危机空前，写实议论势所必然。这样，近代文学和传播所要传达的内容已经趋同。当作家和传播者的身分重合时，作家就不能不考虑到传播文体的读者和以前文学作品的读者是有区别的，因而稍稍改变写法，尽量使自己的作品更适合受众。

“兴观群怨”的文学功能观和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传递遗产的传播功能观也有相同之处。^[22] 身处乱世的大多数近代文人所持的正是这样的文学观念。近人的传播观念也是那样的传播观念。梁启超说：“往往每一书（按：指欧洲政治小说）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23] 文学的功用已与大众传播一般了。

空前且令人震惊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认为欲新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必先新小说。如果我们留意报刊、出版机构的宗旨，就会发现梁启超用小说取代了传播的功能。它已经大大超出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梁氏《变法通议·论幼学》、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对小说功能的认识。但梁氏此际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天下景从。这表明由于时势愈为严峻，传统的政教文学观得到了极度强化，文学和传播在社会功能上已经一致。身兼传播者所必有的受众观念和当时的传媒特性，容易使人们混淆文学与传播文体的界限，在创作中发生互窜现象。

实际上，这些人几乎同时为大众传播制作消息、评论等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即使没有故意的观念混同，制作中的混淆也是难以避免的。梁启超的小说用政论写法，“诗界革命”以诗写新事、阐新理，吴趼人随时札记报刊新闻以供创作，包天笑公开刊登启事征求小说材料，是众所周知的，显然是用制作传播文体的方法来创作文学。^[24] 梁启超的散文也是深染新闻文体色彩的“野狐”。^[25]

这些现象或因文体观念混乱而发，或出于传播的需要而有意这样。李伯元表白自己的《庚子国变弹词》创作时说：

取材于中西报纸者，十之四五；得诸朋辈传述者，十之三四；其为作书人思想所得，取资敷佐者，不过十之一二耳。小说体裁，自应尔尔。^[26]

梁启超回忆维新时期的观念说：

我们的主观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

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27]

他们显然存在着观念的混乱。有人有时的混乱是故意的。梁启超在《劫灰梦传奇》中叹道：

想俺一介书生，无权无勇，又无学问，可以著书传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几桩事情，俺心中所想着那几片道理，编成一部小小传奇，……就算尽我自己一分子的国民责任罢了。^[28]

他重读时发现《新中国未来记》“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却仍把它作为“新小说”的标本发表，并自释曰：“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29]

自然还有不少文人没有参与大众传播，但作为受众，他们难以逃避传播的影响，这种影响或强或弱或显或晦地投射于其文学作品，甚至有的从受众变成主体。

传播学家施拉姆指出：“传统社会的许多人们在第一次接触到大众传播媒介时，都能恰当地看出媒介具有的魔力”。^[30]《时务报》的反响就是最好的例证。^[31]各报刊所载“题词”等感贺作品并非纯是文人之间的标榜、吹捧之类的无聊应酬，有些作者与传播者素昧平生。这些东西多发自他们内心，是他们对“自改革”失望后对传媒这种“权力的媒介”寄予热望的反映。这同早些年文人对墨海书馆用牛拉印刷机的惊诧和调侃不可同日而语。^[32]

更主要的是，传播的内容——主要是消息、政论，也包括